

【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王雅婧 黄惠春

(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学院, 南京 210095)

摘要:推动农村创业创新是新发展阶段稳就业、保民生、促增长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时代分工不断深化,农村创业呈现主体多元化、组织高级化、模式融合化的新特征。马克思分工理论为理解中国农村创业行为变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分工深化是农村创业演进的基本逻辑。数字经济通过深化分工、促进融合创新、加强经营管理推动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经过多年探索,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涌现平台载体型、模式创新型和数字营销型三种成功的数字创业典型做法,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然而实践中,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依然面临诸多现实障碍,未来应弥合数字鸿沟、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合作、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建设、健全农村创业政策支持体系,为加快农业农村数字化进程、激发农村创业创新活力、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方向指引。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马克思分工理论;技术扩散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5)03-0013-12

一、引言

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稳增长、促就业成为经济发展从量到质转变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202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要求“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创业可以从供需两侧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增收和消费增长^[1]。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中,持续鼓励创新创业是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途径。2007年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返乡人员创业、支持合作社兴办企业,农村创业活动蓬勃发展。截至2023年10月末,全国第一产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3.6%^①。但是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创业环境更加艰难和复杂,农村创业资源匮乏,农民创业率低、失败率高。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激发农村创业创新活力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如何推动农村创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是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议题。

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内在要求,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的重要实

收稿日期:2024-08-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工商资本下乡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24FGLB017)

作者简介:王雅婧,女,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黄惠春(通信作者),女,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① 中国政府网:《前三季度新设经营主体2480.8万户 同比增长12.7%》,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1/content_6914480.htm。

践,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拓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强调质量引领、创新驱动、美好共享的发展理念^[2]。相应地,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在农村地区实现氛围活跃、融合创新、高质高效的创业活动。具体而言,氛围活跃是指量的增长,表现为创业主体数量增多、创业组织形式丰富;融合创新是指创业模式创新、种类多样;高质高效是指创业效益良好、就业增收效应显著。高质量发展理念在实践层面对农村创业提出更高要求,在理论层面丰富了农村创业的概念内涵,为本文对农村创业行为及其过程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创业是创业主体参与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最早系统阐述了分工理论,将分工看作工序的划分,并从交换的角度解释了分工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拓展了分工的概念,将分工分为企业的内部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分工两大类。恩格斯^[3]、林其泉^[4]、谢长安和程恩富^[5]继承了马克思的分工思想,将野蛮时代向信息时代发展的进程划分为五次社会大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畜牧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信息业逐渐独立,与上述行业相关的创业岗位大量涌现。社会分工发展推动了职业分化的演进,新职业的产生为劳动主体创业提供了多样化的创业机会。马克思分工理论为理解创业行为变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与传统工业部门不同,农业部门的自然属性、季节特性和产品同质性等使得规模经营在农业生产中具有天然优势,传统农业生产无法采用完全的分工制^[6]。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农业生产环节分离成为可能,现代农业从家庭自然分工向社会化纵向分工与横向分工深化。农村分工的新变化进一步推动农村创业演进,分工深化如何影响农村创业亟待深入探讨。

数字经济时代激发大众创业是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已有研究证实了数字经济的衍生产物,诸如数字金融、宽带下乡、数字乡村等对农户创业的积极影响,并从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成本、拓宽社会网络等方面揭示了其影响机制^[7]。事实上,数字经济对农村创业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技术在创业全过程的渗透来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既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分工格局^[8],进而创新业态、增加创业机会、丰富创业模式,也可以推动数字技术从农村消费端向农业产业端扩散融合,最终促使农村创业呈现氛围活跃、融合创新和高质高效的高质量发展特征。但是,鲜有研究将数字经济、社会分工与农村创业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如何渗透影响农村创业全过程尚不清晰。鉴于此,本文在追溯农村创业与分工深化变化历程的基础上,首先从分工视角阐释农村创业行为演进的理论逻辑,并将数字经济引入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数字技术与社会分工推动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然后通过具体案例介绍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做法,最后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方向指引。

二、中国农村分工与创业的演进逻辑

生产力发展推动商品剩余出现,私有制背景下商品交换兴起、市场雏形显现,不同部门间通过商品交换满足额外需求,从而具备专业化生产的条件,社会大分工由此形成^[9]。马克思辩证地分析了分工的影响,既肯定了分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生产技能熟练,也指出分工会带来城乡与工农对立的消极影响^[10]。特别地,马克思指出分工对就业具有二重影响:一是专业化分工促进机器使用,对体力劳动者形成替代;二是生产效率提高可以扩大市场规模,加速新部门生成,新职业、新岗位、新的创业机会应运而生^[9]。伴随全社会分工细化与新行业大量

衍生,中国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在乡村独特情境与政策演绎下不断发展。本部分追溯分工演进与农村创业的历史脉络,并进一步分析农村分工与创业演进的理论逻辑。

(一) 历史逻辑

一是工农分工与农村创业兴起阶段(1977年以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工农分离,农村社队兴办企业是农村创业萌芽显现的重要标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交换的需要与生产工具的进步推动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由此,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手工业仍占据重要地位,手工作坊成为社队企业的最早来源。1958年农村工业化方针的提出加速了社队兴办工业企业的进程,农村创业萌芽在计划经济驱动下萌发^[11]。

二是分工深化与农村创业发展阶段(1978—1991年)。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领下向纵深铺开,以农村社队为前身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发展壮大。在农业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对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农民兼具生产者与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农业经营者不再受土地生产的约束,农村形成富余劳动力。在工业方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普通农户家庭受资源约束而无力创办企业,具有资本积累的农村社队继续担任创业主体,并通过发展非农产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乡镇企业不断发展壮大^[11]。

三是地域分工与农村创业受阻阶段(1992—2003年)。改革开放后期,多种因素叠加推动工农地域分工,农村既是城市工业发展的原材料产地,也是工业商品销售的主要市场,打工经济日益兴起,农村创业资源逐步流失。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压缩了乡镇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乡镇企业脱农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与当地农业产业上下游间的利益矛盾,农村创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12]。这一时期,农村创业呈现地域分工的特征。农村创业开始向城镇园区聚集,尤其是东部地区凭借资源禀赋和地域优势形成产业集群,快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乡镇企业也由农村企业变成城市企业。与此同时,随着户籍政策的放松,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要素向东部地区工业部门聚集,农民逐渐倾向于离土离乡,农村创业失去必要的人力和物质基础。

四是城乡融合与农村返乡创业热潮阶段(2004—2014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对立等问题愈发凸显,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2004年起,党中央连续发布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下,各地政府多措并举破除城乡要素市场分割、提高农产品交易效率、活跃农村市场经济,加速农业分工深化^[13]。一方面,分工催生新产业新环节,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等农村创业项目增加,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组织的出现丰富了创业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政府密集出台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社会资本下乡投资的政策,农村创业主体多元化势头加快。在制度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农村创业沿农业产业链横向与纵向扩张。

五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下,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正式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倡议^①。同年,农业部印发《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 https://www.cac.gov.cn/2015-12/16/c_1117481112.htm?winzoom=1。

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和应用的总体要求与重点领域。2020 年,中央网信办会同多个部门遴选 117 个县域成为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并于 2024 年继续开展第二批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建设工作。在数字经济浪潮与国家政策的联合驱动下,农业农村数字化、智慧化、信息化程度有效提升,进一步深化了农村分工,重塑了农村创业创新格局,农村创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一是数字技术的加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专业化程度,加速了农村分工细化和融合模式多元化,由此农业生产大数据服务、农产品数字化营销与电商、乡村民宿与旅游等创业机会和创业模式不断涌现。二是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感知、数字分析及数字控制等在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嵌入,推动了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长和农产品品牌建立与传播,由此农村创业效益逐步提升。

(二) 理论逻辑

传统经济下,农村分工按照工农分离、分工深化、地域分工与城乡融合的顺序演进,农村创业随之经历萌芽、发展、阻滞和返乡热潮的历史阶段。在农业与其他产业泾渭分明又逐步融合的进程中,农村分工不断细化,引起创业机会、组织形式以及创业模式的变化。2015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后出台实施“互联网+”行动和大数据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数字经济发展加速分工深化,农村创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由此可见,分工深化是农村创业行为演进的基本逻辑。

第一,农村分工是农村创业机会和创业主体产生的必要前提。一方面,农村创业机会的形成是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创业机会是指能带来价值的新手段和新目标,社会大分工下涌现的新行业、新领域为创业的发生提供新目标和新模式,促进新的创业机会生成。另一方面,农村分工深化是激励多元主体创业的内在动力。农村分工深化不仅增加了市场中的创业机会,还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创业回报。农户、返乡者、社会资本等主体受利益驱动在农村开展创业活动。

第二,农村分工是农村创业的资源基础。一方面,分工影响市场价格机制。市场交换推动了分工的形成,分工亦反过来对交换产生影响。生产者凭借成本优势,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分工,有效降低了市场交易中资源要素的价格和交换成本,从而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价格相对低廉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14]。另一方面,农村分工促进劳动力分化。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创业者收集、利用各种信息,并作出相应决策,实现资源的有效获取和分配。因此,分工有助于农村创业主体提高要素禀赋和资源配置能力,进而建立新组织,提供新服务。

第三,农村分工是农村创业模式融合的根本原因。分工与融合并非对立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分工在一定条件下趋于收敛,融合是将外部分工转化为内部分工的过程和结果。分工深化通过影响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导致交易成本攀升^{[15]71-72}。一是增加农业生产经营环节,提高各环节所需要的资产转移成本;二是农业产业链上生产经营需要交易的对象越来越多,交易频率增加;三是交易次数频繁、程序复杂增加了经营主体决策难度。为降低交易成本,消除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相关创业主体通过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等方式将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融合随之产生^{[15]133}。

三、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21 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浪潮下不断创新,新型数据要素赋能传统生产要素,不仅加速要素融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催生出诸多新业态和新模式,被称为第六次社会大分工^[16]。数字技术客体要素嵌入乡村主体空间,为农村社会的变革与创新注入新力量,深刻

改写了农村分工和创业创新的外部环境。历史上,社会大分工的逐步深化均伴随着生产工具,如铁器、蒸汽机、飞机、互联网等的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是分工的关键所在,数字经济发展是农村分工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分工深化推动农村创业向氛围活跃、融合创新、高质高效的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技术扩散与分工深化是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

(一) 分析框架

数字经济的发展既可以深化分工,也可以为创业创新提供技术支持,进而推动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技术嵌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打破行业壁垒促进专业化分工和融合创新。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引起的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张会带来就业补偿^[17]。本文借鉴马克思分工理论对数字经济与农村创业的关系进行诠释,具体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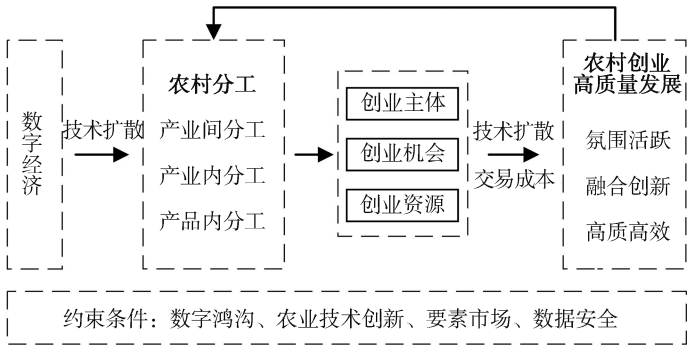


图 1 分析框架

数字经济赋予农村分工进一步深化的时代契机,推动农村创业实现氛围活跃、融合创新和高质高效的高质量发展。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从组织层面引起农村分工深化。技术嵌入通过建立数字平台配置资源,打破产业链间的孤立状态,促进经营主体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网络^[18]。第二,农村分工为创业提供必要条件,是农村创业活跃的基本前提。分工深化促进创业机会生成,并吸引多元创业主体作出创业决策,活跃农村创业氛围。第三,数字技术嵌入创业主体的模式选择与战略决策过程,推动分工更加深化,也促使创业融合创新和高质高效。一方面,在交易成本约束和数字技术支撑下,创业主体依据自身禀赋配置创业资源,并通过选择专业型、工序型、结构型融合等差异化融合方式,实现创业模式的创新^①,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细化分工。另一方面,在创业组织经营管理过程中,创业者对数字技术运用的深度决定了创业平台管理、资源开发、营销方式等具体经营手段的数字化程度。创业过程中数字技术的渗透既在战略决策阶段实现了差异化分工,又通过提高效率影响农村创业绩效,成为创业高质高效的决定性因素。

上述过程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过程中的三种农村分工:一是数字技术加速农村分工深化衍生创业机会;二是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间、产业内扩散,推动农村创业模式分化,从而提高农村创业融合创新程度;三是数字技术在创业组织经营管理中渗透,分化出多种管理方式,进而对农村创业绩效产生影响。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分工按照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的顺序分工深化,每一轮分工都催生与之对应的农村创业行为与融合创新模式,并引起下一轮分工深化,从而实现“农村分工—农村创业创新—农村分工”的良性循

① 本文将农村创业模式分为结构型融合、工序型融合和专业型融合三种。其中,结构型融合是跨农业产业融合的经营模式,例如电子商务、休闲渔业等;工序型融合是沿着农业产业链融合的经营模式,例如农产品加工业、产加销一体化等;专业型融合是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环节渗透的经营模式,例如农机服务、专业育种等。

环。此外,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循环过程受到诸多外界条件约束。

(二) 内在机理

1. 数字经济通过深化分工,推动农村创业氛围活跃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分工影响农村创业决策。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利于分工深化,促进创业机会增加和主体多元化。一是数字技术通过深化农业生产环节、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分工,催生新环节、新产业和新业态,增加农村创业机会。二是数字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与创新,促进农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业投资回报率,由此吸引返乡者和社会资本投资。三是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力分化,高技能劳动力流入非农领域,为农村创业提供人才储备^[19]。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加快信息流通,降低搜寻成本,有利于潜在创业者识别并捕捉创业机会,综合掌握创业风险、创业成本和预期收益等信息,从而进行有效评估并作出有益的创业决策。

数字经济通过深化创业主体内部分工促进农村创业组织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传统生产要素数字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同创业主体选择差异化的资本投入和生产规模,形成不同的创业组织形式,并不断向高级化演进。一是赋能资本要素。数字金融可以缓解农民的正规信贷约束,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促进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创立。相较于个体创业,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农村私营企业的建立^[20],引起不同创业主体组织形式的分化。二是赋能土地要素。现代信息工具的应用拓展了信息获取与交流渠道,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易成本,提高了农民认知水平和未来预期,从而扩大农地流转规模、加速农村内部劳动分工。

2. 数字经济促进技术扩散,加速农村创业模式融合创新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技术在农村产业间及产业内扩散,拓展了农村创业融合模式。一方面,由于技术扩散的特性,从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密集型产业,数字技术渗透成本逐渐增加,融合难度逐渐加大。另一方面,由于产业之间的壁垒不同,数字技术在农业部门内部的扩散速度存在差异,通常表现为从产业链末端“向上倒逼”农业流通、加工和生产环节的特征。因此,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扩散和应用的困难程度按照跨农业产业融合、沿农业产业链融合、与农业生产环节融合的顺序递增。随着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创新和深化,农村创业模式依次按照结构型融合、工序型融合、专业型融合的顺序逐步发展。

农村创业融合创新进一步深化分工。其一,创业主体选择差异化创业模式,在农村产业层面形成新的分工。农业生产经验不足、农业技术掌握不足、风险规避型的创业主体选择结构型创业;有农业生产基础、掌握核心加工技术、有足够资本积累的创业主体选择工序型创业;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掌握核心生产技术、风险承担能力较强的创业主体选择专业型创业。其二,各地区依据自身优势建立产业融合所需要的产业基地,进一步形成农业产业集群,从而实现超细分工与地域分工。具体而言,在集群内核心创业组织的带动下,各类有关产、供、销的涉农生产及服务企业集聚,并通过创新和发展共同技术,促进产业内进一步超细分工^[21],进而提高生产率并创造更多创业机会,最终推动新一轮循环开启。

3. 数字经济加强经营管理分化,推动农村创业提质增效

数字经济的发展深化了创业组织数字技能运用和数字技术采纳,推动数字经营管理方式与传统方式分离,从而影响农村创业绩效。代理人的战略抉择是决定组织绩效的最直接因素。数字经济发展为创业组织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先进的管理设备、范式和人才,帮助创业组织在发展导向、模式选择、资源开发等方面作出差异决策,从而提高创业组织的经营绩效。第一,以大数据中心、数字生产信息平台等为代表的数字化管理设备可以收集市场信息、存储和

管理数据,为创业主体提供数据集,降低组织创新风险,增强竞争力。第二,智能运营、数字营销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推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和销售方式的变革创新,通过简化工作流程、搭建媒体平台,优化决策层级、降低内部管理和外部信息成本,从而提高经营绩效。第三,数字化的管理人才可以帮助组织搜寻和识别有价值的资源,提高其数字技术的创新运用水平,进而突破资源约束,提升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创业绩效增长受到数字鸿沟、农业技术创新不足、市场分割和数据安全问题等因素的制约。第一,数字鸿沟加剧。农村内部经济发展、居民受教育水平的不均衡加剧了数字鸿沟,农村数字素养水平较低的创业主体在机会识别和资源利用方面受阻,不利于其作出对自身有益的创业决策。第二,农业技术创新不足。受限于农业弱质性,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困难,叠加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间较高的渗透成本,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扩散缓慢,进而阻碍农村创业机会和创业模式的衍生。第三,要素市场分割。要素市场分割不利于信息、技术等新要素对传统要素赋能,会降低创业者资源配置效率,制约创业绩效增长和创业活动持续。第四,数据安全问题。数据的流动性、共享性和可复制性增加了数据泄漏风险,不利于创业机会扩散和创业主体公平竞争。

四、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及困境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分工和融合更加深化,为农村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市场机遇,农村创业持续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并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农村创业机会增多、主体多元化发展;二是农村创业模式融合创新程度提高;三是就业增收带动效应显著。在农村创业活动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涌现诸多数字创业的典型做法,既是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的创新实践,也为推动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由于农村地区数字化人才短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数字基础薄弱、相关制度不健全等诸多现实问题,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亦受到了阻碍。

(一) 创业模式

1. 平台载体型:福建晋江

平台载体型创业通过搭建数字平台实现创业机会与创业主体的信息匹配,吸引农村人才、资金和资源聚集,推动农村创业主体总量扩大和结构多元化,深化创业主体分工。福建晋江、宿州砀山、吉林双阳等地利用平台载体,推动了创业资源聚集,促进了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其中,福建晋江入选“全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是全国农村创新创业平台构建的示范样本。福建晋江从两个方面构建创新平台:第一,搭建孵化共享平台。通过建设创业创新园、智能装备产业园、福大晋江科教园等科技创新载体,为农业农村各类人才创业创新提供了物理空间。2018年,“农业星创天地”正式挂牌运营以来,吸引了20家涉农企业和15个农业院校团队入驻。第二,搭建校地合作平台。福建晋江和11所高校签订农村创业创新合作协议,成立系列农林大学创业基地,致力于数字农业和人才等方面的深入合作。截至2020年,福建晋江建立高素质农业农村“双创”团队38个、大学生创业的规模农场达50家。

平台载体型创业是数字经济通过深化分工推动创业氛围活跃的具体应用。该模式多由政府部门牵头,产生于信息流通不畅地区以及农村创业发展初期。平台载体型创业通过搭建平台加快创业主体和创业资源聚集与共享,降低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加强创业主体与创业机会精准匹配,促进劳动分工细化,进而催生更多创业机会,最终实现创业主体多元化发

展,有效活跃了创业氛围。平台载体型创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创业融资难、用地难、吸引人才难和风险高等问题,也为创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资源、技术支持和市场信息,推进了农业产业数字化。

2. 融合创新型:辽宁十家子

融合创新型创业是指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将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相融合,通过选择专业型、工序型和结构型融合来实现创业的分工。辽宁十家子、浙江安吉、山东源泉等地都通过生产经营环节的模式创新,推动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辽宁十家子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入选“全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典型”,为模式创新型创业提供典型模板。从生产过程来看,该地通过大数据终端的数据汇总实现种苗供给、土地管理、采摘收割一体记录服务,确保生产专业化和标准化,实现专业型融合。从加工过程来看,通过确定清洗、分包的等级标准,推动农产品初加工的标准化,并与沈阳农大等院校合作,共同开发绿色健康食品,从而实现工序型融合。从销售过程来看,先后在辽宁以及上海等地创立实体店,并和淘宝等大型平台对接,拓展了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渠道,进而构建了“线下体验、网络订购、云仓发货”的电商平台运营机制,实现了电子物流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结构型融合,为农产品进城奠定了基础。

融合创新模式是数字经济促进技术扩散、加速农村创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实践。该模式适用于有创业基础但缺乏创新活力的农村地区。融合创新型强调在保留地区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强化农业技术在农业产业中的扩散,在生产、加工与销售过程中提高农业技术应用水平,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打破产业壁垒、加快新业态培育,从而推动创业模式分化和创新,最终拓展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放大农业农村原始生态魅力、实现各类创业主体与农民共享的增值效益。融合创新型创业有效推动了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和农业多功能拓展,以数字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产品附加值增长,促进了农村创业融合创新。

3. 数字营销型:浙江松阳

数字营销型创业是利用互联网、计算机通信技术、数字化互动媒介来推广农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并提升品牌价值的营销策略,与传统线下营销方式实现分离。浙江松阳、四川盐边、河北承德等地涌现一批成功的农村数字营销案例,其中浙江麻功佐作为返乡创业青年荣获“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是农村数字营销型创业的优秀典范。2014年,麻功佐成立中华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并创立“电商+合作社+土蜂蜜”营销模式,开始农业经营。2018年,麻功佐在自媒体账号上发布养蜜蜂视频,并通过不断调整视频创意、坚持发布优质内容、长期与粉丝互动等方式实现粉丝总量400万的跨越。在粉丝数量持续增长过程中,麻功佐的土蜂蜜订单越来越多,最高销量一天达500斤,年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在数字媒体和电商技术的帮助下,2020年麻功佐的土蜂蜜销售额达2000万元。同时,在麻功佐成功创业的激励下,30多位返乡青年受到鼓舞,开始运用互联网手段进行创业,同县100多户蜂农将线下养殖与线上销售相结合,实现增收560余万元。

数字营销型创业是数字经济加强经营管理分化、推动农村创业提质增效的积极探索。该做法适用于产品质量有保障但知名度不足的农村个体创业者。数字营销型创业通过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传统经营管理方式与数字销售方式的分化,不仅打破农产品供需双方的信息壁垒、降低信息搜寻和市场推广成本、提高创业组织营销效率,还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目标受众的精准触达,有效激发顾客潜在需求、提高农产品品牌价值。从本质来看,数字营销型创业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体平台实现销售方式的数字变革,视频直播、实时互动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双方信任感和品牌知名度,促进了农村创业主体经营绩效提升和收

人增长。受到高创业回报预期的激励,更多潜在创业者进入市场,并通过效仿学习实现就业增收。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时代,全国各农村地区都经历了漫长的实践探索,摸索出适宜自身发展的创新创业模式。通过对比发现,这些模式衍生于不同分工环节和创业过程,适用于差异化的行为主体和发展阶段,有效推动了农村创业活跃、融合创新与高质高效,充分体现了分工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农村创业实体融合的思路。三种典型做法的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典型做法对比

	平台载体型	融合创新型	数字营销型
创业过程	创业机会发现阶段	创业模式选择阶段	创业经营管理阶段
适用条件	相关信息流通不畅、农村创业发展初期	有创业基础但缺乏创新活力的农村地区	产品质量有保障但知名度不足的个体创业者
实施效果	创业机会与主体多元化	创业融合创新程度提高	就业增收带动效应显著

(二) 现实困境与原因分析

实践中,各地农村创业典型做法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具体思路,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农业技术攻坚难和农村地区资源限制等问题,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1. 数字化人才短缺,农村分工与创业的根本支撑不强

农村数字化人才缺失不利于农业生产相关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渗透缓慢,阻碍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组织的形成与分化,从而造成农村创业机会匮乏。一方面,农村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在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地区空心化问题突出,尤其缺乏专业技术和创新人才,难以匹配农村创新创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农村地区对内缺乏科学、系统的人才培养规划,对外人才引进政策力度较弱。2021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共培养高素质农民 71.70 万人,仅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 0.42%^①。

2. 技术创新不足,农村分工与创业模式融合缺乏内生动力

技术进步是深化农村分工和破除产业壁垒的关键因素。数字技术创新不足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阻碍农村分工细化,也不利于降低农业产业融合成本,最终导致农村创业效率低下、成本较高、业态匮乏。一是关键技术研发不足。数字基础设施是农村创新创业的基础支撑,但我国在某些关键零件以及先进材料生产等方面依赖国外进口,技术难关尚未突破。二是农业技术创新不足。农业技术创新前期投入较大、周期较长、风险较高,在农村地区进行创业并获得较高利润存在技术困难。三是数字技术与创业实体融合程度不高。农业农村各场景对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仍以单项技术为主,集成场景缺失。

3. 数字基础薄弱,农村分工原料与创业资源获取困难

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不足、资源流动性约束会阻碍新组织、新业态分化,降低创业预期收益、提高创业成本,不利于激发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和投资积极性。一是农村地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截至 2023 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6.50%,仍比城市地区低 16.80 个百分点^②。二是农村创业信息化服务有限。多数农民创业依赖以亲属、朋友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对创业机会、行业门槛、发展前景等信息把握不足,容易在信息掌握不完全的情况下作出不利决策。三是农村地区数据要素对传统要素赋能不足,创业资源缺乏流动性。

①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2022 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 53 次)》, <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322/c88-10964.html>。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滞缓,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不足,创业者资金和用地需求难以有效满足^①。

4. 相关制度不健全,农村风险防范机制缺失

一方面,关于数据确权、流动和保护的法律缺失。一是统一的数据管理、服务和安全体系尚未形成;二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三农”数据公开范围,容易造成数据垄断;三是基于高科技采集的数据有泄漏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创新创业政策还处于发展阶段,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完备。一是农村地区政策滞后。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政策出台较晚,且支持力度远不及城市。二是农村创业政策门槛较高,针对性不足。各地区创业优惠政策同质性问题严重,导致大多数农村创业者达不到门槛就无法享受优惠。三是政策监管力度不足,落实难度较大。当前,农村地方政府部门对创业创新政策落实不到位,亟需有效的监督机制规范矫正。

五、数字经济时代农村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农村创业和融合创新,是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探索与创新实践。为提高数字经济推动农村创业的有效性,应从弥合数字鸿沟、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合作、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建设、健全农村创业政策支持体系出发,努力破解数字经济创业效能发挥的约束瓶颈,从而加快农业农村数字化进程、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引领高质量乡村振兴。

(一) 弥合供需两侧的数字鸿沟,夯实数字经济推动农村创业的重要基石

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人才培育是实现数实融合发展的先决条件。第一,优化投融资机制,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多层次数字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设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并利用专项债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第二,建立健全农村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农村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加强数字教育基础平台建设,完善人才引导下乡机制,设立农业科技创新类人才津贴,鼓励农业科技创新人才以技术入股乡村企业,全面增强农村创业人才储备。第三,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应用率为目标,增强农村创业服务实际效果。兼顾区域需求差异和基建类型差异,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迭代升级以及应用场景更新,加强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智慧农业产业园区、电商直播基地等建设。

(二)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合作,激发农村分工深化的内生动力

农业科技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分工深化与创业创新的原动力。第一,攻克农业技术难关。着力加强农业科技相关的国家级、省级和企业实验室建设,重点强化共性问题的应用研究。第二,整合现有农村数字技术资源,为农村数字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从国家与省级两个层面建立数字农业技术体系,支持成立跨区域、多学科农村数字产业创新同盟,确定数字农业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推进关键领域研发工作。第三,建立数字农业标准体系。明确不同农业产业和层次的数据标准,并将标准制定工作委托给农业与信息复合型部门,对农业农村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分析,解决农业不同部门、环节与行业之间的数据衔接难题。第四,强化农业技术渗透与产业链合作。加快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方案出台实施,并依据分工环节开展针对性的数字技术推广工作,建立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预测、生产以及信息流通机制,加强农业产业链深度合作。

^① 农业农村部:《培育创新创业领头雁 打造创新创业升级版——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负责人就〈关于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答记者问》,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06/t20200618_6346701.htm。

(三) 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建设, 优化融合创新的生态环境

统一要素市场建设是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基本前提。第一, 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 提供基础要素支撑。统筹建设用地的存量和增量, 完善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和抵押二级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第二, 建立健全统一资本要素市场, 发挥金融效能。强化对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 建立健全责任清晰、分工明确、运行畅通的安全监管体系。第三, 加快培育统一的城乡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 强化创新动力。建设要素制度规范, 鼓励农业大数据公司建立, 加快农业数据要素产业集聚, 构建统一的农业数据资源体系, 为农业数据确权登记、质量评估、价值评估、资产入表等提供全链条支撑。

(四) 健全农村创业政策支持体系, 强化农民创业创新的政策保障

建立健全农村创业创新政策是推动农民创业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障。第一, 坚持农村创业创新政策分散设计与集中打包相结合, 提高政策间的耦合性与协同性。统筹农村创业相关财政、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 依据农村创业主体条件、组织规模、经营类型等制定差异化创业支持政策, 并持续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强化创业创新信贷支持。第二,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 加强政策运行机动性与灵活性。因地制宜落实推动农村创新创业的典型做法, 积极搭建农村创新创业平台、鼓励创业模式创新、推广数字营销技能等。积极培育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健全农村创业动态跟踪机制和政策效果评价体系, 畅通农村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第三,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拓宽农村创业主体来源。搭建互联网创业平台, 大力树立并宣传农村创业的成功典型, 完善招商工作机制, 充分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农村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赵昕东, 吴炜聪. 中小银行规模、地方政府负债与创业活力[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4): 36-46.

[2]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等.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J]. 管理世界, 2019(7): 1-7.

[3]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76.

[4] 林其泉. 分工的起源和发展[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85.

[5] 谢长安, 程恩富. 分工深化论: 五次社会大分工与部门内分工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12): 46-58.

[6] 罗必良. 论服务规模经营——从纵向分工到横向分工及连片专业化[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11): 2-16.

[7] 赵佳佳, 魏娟, 刘天军. 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5): 61-80.

[8] 马德隆, 许正中. 马克思分工理论与数字时代产业融合[J]. 经济学家, 2023(1): 5-14.

[9]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410, 510, 517, 523.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57.

[11] 萧冬连.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J]. 中共党史研究, 2021(5): 46-59.

[12] 庄晋财, 尹金承, 庄子悦.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创业的演变轨迹及未来展望[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7): 83-92.

[13] 厉以宁, 辜胜阻, 高培勇, 等. 中国经济学 70 年: 回顾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笔谈(下)[J]. 经济研究, 2019(10): 4-23.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265.

[15] 奥利弗·E·威廉姆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 段毅才, 王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6] 戚聿东, 丁述磊, 刘翠花. 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促进专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基于社会分工视角[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58-69.

[17] 刘翠花, 戚聿东. 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扩容提质的理论逻辑、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J]. 理论学刊, 2023(4): 129-141.

[18] 易恩文, 姚常成, 杨慧玲.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塑造城市网络——基于社会分工的视角[J]. 经济评论, 2024(3): 126-141.

[19] 田鸽, 张勋. 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J]. 管理世界, 2022(5): 72-84.

[20] 黄祖辉, 宋文豪, 叶春辉.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与机理——来自中国 1845 个县域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23(4): 92-110.

[21] 苏毅清, 游玉婷, 王志刚.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 2016(8): 17-28.

(责任编辑: 李凌)

The Mechanism and Path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WANG Yajing HUANG Huichun

Abstract: Foster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s a crucial strategy for stabilizing employment, securing livelihoods, and driving growth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tensifie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exhibits new traits such as diverse entities, advanc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integrated models. Marx’s theory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offers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comprehending the shifts in rur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China, with the deepening of division of labor serving as the fundamental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The digital economy propels the high-quality advancement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by enhanc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fostering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reinforcing management differentiation. Following years of exploration, three exemplary models of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have emerged in rural areas nationwide: platform-based, innovation-driven, and digital marketing-centric.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s advancing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practical challenges persist in the realm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within the digital economy. Moving forward, it is essential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bolster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chain collaboration, expedi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actor markets, and refine the policy support framework for rural entrepreneurship. These measures will offer critical guid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gniting the vitality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Marx’s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Technological Diffusion